

主持,聪明才俊之所奔赴,其中流弊必不在小。载笔之士不思挽救,无为贵著述矣。苟欲有所挽救,则必逆于时趋。”^①然则时处今日,崇尚理论和方法正赅赅乎成为“世俗风尚”,读懂陈旭麓先生史学中的这一面,至少可以使我们看到:治史之际,与外在于主体的理论和方法相互对待的,还有内在于主体的史识、史才、史学、史德;与可以化为方法的理论相互对待的,还有“无法之法”的理论思维能力。在这种相互对待里,内在的一面和外在一面都会以自己的合理性影响今日的史学,但每一种合理性同时又都是一种自我限定的度,若一成“时趋”便一定会“必有所偏”。其间的分野和关联在于,能够养成内在一面,则内有所立和内有所恃,主体能够运用理论和方法;没有养成内在一面,则内无所立和内无所恃,主体只能被理论和方法所支配。就认识历史、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而言,两者的结果显然不会一样。三十多年来,我以读史为业,而资质鲁钝,领悟陈先生所教常常后知后觉,独于此端之理,获益稍多。

作为老师,陈旭麓先生以学问立身,对于学生,学问便成为一种真实的感召。中国人的文化以实至名归为理所当然,而人生舛错,名之为名,常常与势相缠,又常常与利相缠,名实之间有时未必尽能相合。我们当年入陈先生门下,读的是硕士。记得1986年或1987年间,黄逸平老师曾私下对我说,陈旭麓先生正在申报博士招生资格,等批下来,我们准备推荐你提前毕业,报考博士研究生,言次,对于这件事期望甚殷。然而这件事最终如泥牛入海,全无声息。当日此类申报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,过程之间环节重重,我始终不知道其中的因果,但以人比人,由此而得的结果对于陈先生的不公平是非常明显的。与黄逸平老师不同的是,陈先生本人从未在学生面前提及过这个话题,而学人生涯经此一劫,此中的滋味则是可想见的。由于旁观了这一段曲折,以及由此显现的七颠八倒,陈先生谢世之后我遂无意再读博士,所以至今仍然功名不全。而作为一种附带的影响,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“世无孔子,不当在弟子之列”的自由、自立和自主。相隔了三十年之后反观当初情状,这些往日旧事已成过眼烟云。亦见一时之七颠八倒和促成了七颠八倒的人经不起时间的磨洗,至今已被西风吹尽,了无尘迹。与此对比而见的,则是陈旭麓先生的著述三十年来在学界流布不绝,历时弥久而更显其经典意义。流布的过程已不仅影响了我们这一代,并且影响我们之后的一代。而曾经的名实之间不能相合,也因此而在岁月的流逝中达到了名实的相合。所以,今人好以刊物之等类、人物的名位以及格式化的评议为学术作品分优劣,比较而言,我更相信,从而更敬畏的,却是春去秋来,年复一年的时间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,我们毕竟已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曾经的满天烟花(中国烟花和外国烟花)在光焰熄灭之后化作一地灰烬。而以陈先生的生前身后为实例,显见得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之价值的判定,其实只能是在光阴的过滤和淘汰中实现的。

“设置问题”与“无法之法”的史学大家

许纪霖

(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)

今年是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年,他离开我们也有三十年了。我记得1987年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之后,陈先生就让他学生周武带话给我,请我到 he 家里与我谈谈。一个30岁的年轻人,见到陈先生,是如何的诚惶诚恐,他的一口浓重湖南话我也大部分没有听懂,如今记得的,大致只是对我的勉励。1988年我硕士毕业,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陈先生,论文题目写的是张君勱的政治思想,虽然稚嫩,也受到了陈先生的谬赞,先生还在给友人的书信里提了一笔。^②

^① 章学诚著、莱瑛校注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(上),第1页。

^② 陈旭麓:《致沈渭滨(1988年6月26日)》,氏著《陈旭麓文集》第4卷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498页。

陈先生走得那样快、那样早，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70岁，正是他研究的巅峰时期，许多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的想法和思考，就随着他的生命离开而被带走了。这，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。陈先生身后的这三十年，史学界的变迁何其迅速，各种思潮各领风骚三五年，昨天还是洛阳纸贵的畅销书，今天就无人问津，被遗忘在历史的故纸堆了。但陈先生的遗作，不温不火，成为穿透历史时光的畅销书，几乎每一个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生都读过他的书。陈先生以“新陈代谢”为核心的研究，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经典范式。

今天我们纪念陈先生的史学思想，有两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，第一，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界，他的学术与思想突破在哪里？第二，陈先生的史学遗产里，对于今日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，哪些是值得继承的传统？陈先生最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，是一个无论从国家政治、思想文化，还是学术层面都是拨乱反正的转折年代。那个时代是开放的、自由的，同时又是保守的、教条的，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点也不亚于清末民初。作为一个老学者，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。

按照我的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，陈先生属于“后五四”一代学者，在1949年之前接受了完整的教养。一些民国过来的老学者，很想趋新，但几十年的洗脑，思想已经僵化，提不出新的、有价值的看法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陈先生不一样，他在民国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底子，以后也没有随波逐流，停止自己的思考，于是，到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来临，就有了学术上的大爆发。

最近我重新阅读《陈旭麓文存》，这些著作和文章基本上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，在那个年代，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深度，有那样独特的视野和角度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，史学界还是以“三次革命高潮”“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”为“政治正确”的主流意识形态，要突破那些僵硬的研究模式，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。

突破是当时许多学者都在努力的事儿，但陈先生以六十岁的年龄，比大部分人都走得更远。他一直在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：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脉络？在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主流传统的时候，他提出要将历史研究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，在当时可容忍的尺度里面，提醒大家要注意历史本身的内在理路，而不为僵硬的教条所束缚。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，许多年轻人都在玩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、新概念，比如结构主义、功能主义、存在主义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等。陈先生不玩理论，但他会注意这些新思潮，内化到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之中，不露丝毫痕迹。

陈先生是有自己的历史观的，他不满足于史学的碎片研究，试图从整体的历史演化中提炼出基本的规律和大思路、大脉络。你看他发表的文章，都是一些能够提纲挈领的大问题：《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》《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》《一与多、体与用》《论中体西用》《传统、启蒙、现代化》等等。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公共普遍性的重要话题，陈先生不仅是思考者，而且是引领者，他是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大家。

在他的晚年，他提炼出了著名的“新陈代谢”的中国近代史演化观，并且以这一核心主题串讲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。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是陈先生最完整、最具体系性的一部著作，至今为止影响也很大，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经典范式之一。

这一“新陈代谢”的研究范式，显然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模式的影响。近代中国的历史，不再是革命、再革命、通过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，而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，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。在当时，这是一个范式的大突破，大革命。

现代化模式自然有其内在的限制。我在1995年与一批国内的学者共同撰写《中国现代化史》的时候，用的也是这一叙述模式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史学界已经对这一模式有了许多反思，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吊诡性也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会。我相信，假如陈先生生活到今天，也会对自己的“新陈代谢”分析范式有进一步的思考 and 完善的，他不是一个简单的、直线论的进化论者，可能更接近章太炎的“俱分进化论”，善在进化、恶亦进化，他一定会注意到历史发展中的多面性格，这在他留下的多处文字中可以看到端倪。

我重新阅读陈先生的遗作,最大的感叹是他是一个设定议题的大家,史学界后来成为热点的许多研究领域,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发现了,而且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和论述。比如海派文化、上海学的研究,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、中国革命的研究,以及中等社会的研究等等。

这几年来我经常向学生提一个问题:是陈景润伟大,还是哥德巴赫伟大?一般人会以为陈景润伟大,因为他接近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了。但在我看来,最伟大的人物,不是解决问题的高手,而是提出问题的大家。胡适所说的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”,要“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”,都是鼓励学者们善于发现问题,提出问题。提出问题的大家,虽然很有可能一辈子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但正是他设定了议题,开创了新的研究论域,让无数后来者来讨论与攻克难关。什么是具有大价值的创新?不是解决了已有问题,而是开创了新问题、新空间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的大学教育至今似乎依然还不明白,总是要求学者和学生去解决问题,而不是鼓励提出问题,引领研究的新论域、新方向。

回过头来看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几个大话题,在我看来可能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。就举一个例子,陈先生有一篇题为《神道与圣道》的文章,就提出了一些大问题,中国历史上有孔子为代表的上流社会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圣道,也有社会底层的民俗信仰的神道,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结构。但是,神道与圣道又是如何互相镶嵌的?圣道是如何神圣化的?比如,儒家究竟是人文教化还是一种宗教?相信圣道的儒家士大夫,为什么依然迷恋“怪力乱神”的神道?在民国初年,康有为搞孔教会,还有包括严复在内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在搞灵学会呢!陈先生在三十年前注意到的重大问题,至今,史学界的研究依然是单薄的。而类似有价值的题目,在陈先生那里还有不少。

陈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广泛的影响,不一定在于其具体的结论,在我看来,而是有两个,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议题设置的能力,我们今天的不少研究,还是在陈先生提出的大问题、大架构之内。第二个是陈先生独特的研究方法。

什么是陈先生的史学研究方法?我的理解是一种“无法之法”。20世纪80年代,为了突破僵化的传统理论,稍微趋新一点的学者都很迷恋新理论、新方法,似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,像自然科学一样,只要有了一种科学的方法,就包治百病,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有一位研究科学出身的青年思想史学者,就很得意地对我说:“你看,用西方的方法论,找中国思想的问题,一抓一个准!”

不用说,当年初出茅庐的我,也很迷信这套新理论、新方法,好像没有理论,就无法提升。不过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今天,史学界的风向又变了,从迷信理论转向迷信史料,似乎只要找到独家的史料,特别是终极性的核心史料,历史学就此终结,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

那么,陈先生又是如何做研究的呢?我发现,他虽然重视史料,也关注理论,但绝不迷信史料和理论。他既不以史料见长,也不玩弄各种理论。作为一位老派的历史学家,他重视的是对历史本身、特别是历史的内在脉络和深层意义的体会和解读。陈先生最令人佩服的,是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,他都有独到的见识,不是一般的见识,而是大见识。

这种大见识,基于对基本史料的理解,也可能受到了理论的启发,但陈先生绝不卖弄理论,更不堆砌史料,而是以自己理解的历史内在脉络为经纬,将历史事件、人物娓娓道来,穿插于独到的大见识。这种功夫,很难提炼成为一种科学的、形式的、规范的方法,那是靠几十年的史学积累和人生阅历慢工细活煎熬出来的。看起来似乎没有方法,其实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研究大法——无法之法。

学问做到今天,我才真正体会到,研究最后比拼的,不是史料,不是理论,而是境界,既是对历史理解的境界,也是对人生体验的境界。陈先生的晚年学问,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,就像他的人格一样。作为曾经得到他亲炙的学生一辈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!

在学术日趋规范化、模式化的今天,陈先生留下的许多好传统反而失去了,被我们丢掉了、忘记了。我认为,对陈先生最好的纪念,就是将他的史学研究传统提炼总结出来,化为自己的研究实践,并尽可能地感染、传授给自己的学生。